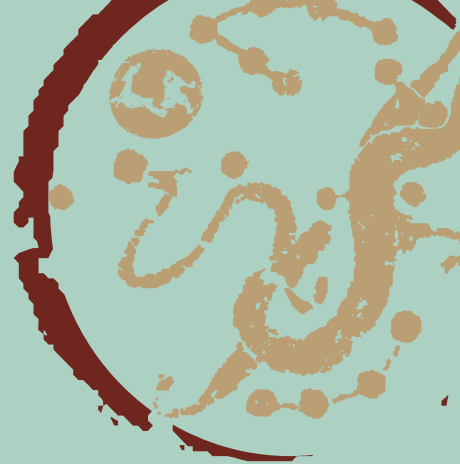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

Newsletter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學術通訊

No. **1** 2014

第二十九期



第二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



2014年3月18-19日，我院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合作举办第二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文史研究院院长杨志刚教授与京都大学地理学研究室田中和子教授、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木津祐子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研讨会共分八场，主题分别为：古代思想世界、东亚的历史和现实、佛教与道教、在东亚的西方、地理·旅游·历史、中古的诗与文、现代语言与文学以及艺术、仪式与信仰。来自京都大学的12名博士生与复旦大学人文学科的16名博士生就论题进行了交流，并得到参会老师的点评。



3月20日至21日，两校师生分别参访了西塘古镇（右图）、上海博物馆（左图，善本古籍特藏室）和徐家汇天主教建筑群。

目 录

第二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综述	2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行记 /□邓 菲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5
滋贺县高月町芳洲文库访书记 /□朱莉丽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7
文史讲堂	
清代举子之旅——从广东到北京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10
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耶鲁大学荣誉教授 郑培凯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	13
小型学术研究会	
杨志刚 遥远的史实,近旁的回响——孔庙历史与遗产漫谈	16
Michael Schiltz 通往帝国之路的货币:日本黄金单本位制的确立,1873-1897	17
罗汇(Rui O. Lopes) 葡萄牙中国学研究之路:过去、现状与未来	18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简报(第三十四至三十五期)	19
新书介绍 《藩王的屏风》、《中国再考》、《神文时代》	21
外刊撷英	23
第四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招生启事	28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2014.01—2014.03)	30

第二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 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综述

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于2014年3月18至19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报告厅召开。京都大学一方,由田中和子、木津祐子两位教授带领中国历史、文学、哲学及旅游专业的12位博士生参会。复旦大学的16位参会博士生,分别来自文史研究院、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中文系等院系。

3月18日上午8:30,研讨会正式开始。开幕式由文史研究院董少新研究员主持,院长杨志刚教授与京都大学田中和子教授、木津祐子教授分别致辞,对参会的年轻学者予以赞扬和鼓励,并期望在座的中日博士生在此次论坛中互相学习、深入交流,建立长久的学术友谊。

本次研讨会共分八场,主题分别为“古代思想世界”、“东亚的历史和现实”、“佛教与道教”、“在东亚的西方”、“地理·旅游·历史”、“中古的诗与文”、“现代语言与文学”以及“艺术、仪式与信仰”。其中第一至第五场于18日举行,第六至第八场于19日上午举行。

第一场报告“古代思想世界”由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佳主持。报告的三篇文章通过对经典文献的



研究,展现中国古代的思维、信仰体系和精神世界。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木村亮太的《“九州”和经学的世界》一文,通过对南北朝时期《公羊疏》和《经典释文》的文献分析,阐释了南北朝人对“九州”的看法。文史研究院谢一峰的《再论“洛州无影”》一文认为,“洛州无影”的提出既不是用“洛州”去指代中印度的某一特定地方,也不是义净去登封周公测影台所记录的无影现象,而更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典故。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金东镇的《〈管子四篇〉中〈心术上〉与〈内业〉之比较》一文,通过对《心术上》和《内业》的比较后指出,两篇都与“治心”与“治国”有着紧



密的联结,但在具体内容上还是各有差异和特色。

第二场报告“东亚的历史和现实”仍由张佳老师主持。由于生活在同一个文化圈中,东亚各国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报告的三篇文章分别从宗藩关系、朝贡体系、人员流动等角度讨论了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动的过程。历史系李春园的《中统建元之际蒙、丽关系转折补论——读金坛〈与张学士书〉札记》一文认为,中统建元之际蒙、丽关系的转折是忽必烈与在华北的蒙廷儒臣以及高丽政权多方互动的结果,忽必烈并非甫一上台就有明确的设想并且付诸实践。文史研究院冯超的《清越朝贡与邦交关系(1820-1850)——以越南北行使团为中心》一文,以越南北行使团为切入点,选取了1820-1850年(清道光朝,越南阮朝明命、绍治和嗣德初年)为研究时段,对清越朝贡与邦交关系的两面性做了进一步阐释。京都大学社会学研究室松谷実のりの《全球化与个人的跨国流动:以在上海的日本人为例》一文,通过抽样方法,对在沪“现地采用”的日本人进行了调查。作者研究发现,“现地采用”的日本人是个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迁移后的“现地采用”者仍然面临生活与工作等诸多问题,例如社会保障和解雇风险等。



第三场报告“佛教与道教”由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段志强主持,三篇文章分别论及佛教禅语、佛道教文本解释及流传等问题。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古胜亮的《“堂堂密密”及象骨山》一文,对唐末禅僧雪峰义存教团中常用的“堂堂密密”禅语的词义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堂堂”和“密密”都是唐五代禅师用来形容“道”、“佛性”、“本来面目”的词汇。而在雪峰教团中,又被用来形容具体的象骨山(雪峰山),将具体之物的象

骨山作为“法性”的象征。文史研究院李鸿坤的《宗教经典及其假设框架:论宗教经典的内容与历史实践的关系》一文,讨论了处理宗教文献时的一些理论问题。作者以道教玉皇大帝为例,讨论了玉皇大帝信仰中文本与现实的结合与对应。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佐藤礼子的《别生经与唐代传奇》一文,考察了日本七寺所藏的平安时期写经“一切经”中的《胜光王信佛经》与唐代传奇的关系。作者指出,义净对《说一切有部律》的翻译也体现出唐代俗讲的流行,唐代传奇中长篇虚构的世俗故事诞生的背景中存在着《有部律》翻译的影响。

第四场报告“在东亚的西方”仍由段志强老师主持。报告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西方文明对东亚的影响,包括天主教对中国家学的发展、中国现代医学组织的转型和交往、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等。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申的《〈齐家西学〉与家学的天主化》一文,对明末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所著的《齐家西学》进行了研究。作者指出,《铎书》和《家学浅论》对《齐家西学》的有选择的继承,是当时中国士人站在实学实理的立场上对西学资源进行取舍的结果。文史研究院王皓的《在歧异与博弈中前进:对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合并的再思》,分析了博医会和中华医学会合并的背景,并揭示了中国现代医学转型中中外多方力量的博弈和复杂关系。京都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田访的《日本中国哲学研究之一端:1949-2013〈日本中国学会报〉哲学类论文统计与分析》,通过对六十余年来共65期《日本中国学会报》所载的中国哲学类论文进行分类统计,尝试勾勒出“日本中国哲学研究”的总轮廓。

第五场报告“地理·旅游·历史”由京都大学田中和子教授主持,五篇文章分别讨论了产业集聚、旅游观光、区域环境变迁、区划变迁等历史地理议题。京都大学地理学研究室纲岛圣的《同業者町の慣習、調整と移動—明治・大正期大阪の材木業集積の事例》一文,以木材业为例,研究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产业集聚的形式、调整与移动。京都大学地理学研究室朝仓慎人的《体験型観光地における農村性の意義—東京大都市圏緑邊部“たくみの里”を事例に》,以东京大都市东北部的“たくみの里”,分析了郊区农村发展体验观光旅游业的意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闫芳芳的《1875年



以来上海地区淀泖湖荡群水域面积变化研究》一文,利用 MapInfo 软件对不同时期的地图进行数字化处理,重建出 1875 年、1918 年、1959 年、1978 年、2000 年五个时期淀泖湖荡群的水域面积,并结合史料记载,对区域湖荡的水域面积变化做了初步的量化比较。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姜建国的《明代云南武定府的改土归流及掌土治民方式的变迁》一文,综合史料认为,将武定府改土归流的时间定于隆庆元年或许更为合理。历史系杨晨宇的《清朝时期的卫所“民化”:以清朝的法律文献为中心》一文,依据清朝历代法律文献,从法律条文的规定入手,分析卫所“民化”的过程在法律上的体现。

第六场报告“中古的诗与文”由京都大学木津祐子教授主持,三篇文章分别从诗文的主题、文论、书论和文本的选取等角度进行分析,来说明文学作品与时代和历史的互动关系。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山本浩史的《“俯瞰”与“隔绝”:鲍照乐府诗的主题》一文,试图在“俯瞰”、“隔绝”的两个主题下分析鲍照的乐府诗,由此考察鲍照在此主题下对下层人民的感情的描写。同研究室成田健太郎的《中古文论、书论所见“韵”论与“笔”论》,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书论、文论中“韵”与“笔”论的演变与关系。文史研究院邵小龙的《扬雄〈蜀都赋〉未入〈文选〉探赜》一文,探讨了扬雄《蜀都赋》未收入《文选》的原因。

第七场报告“现代语言与文学”仍由木津祐子教授主持。三篇文章分别从语言学、符号学等角度讨论了汉字的音调、汉语外来成分以及小说的意向性等问题。京都大学中国语文研究室八木坚二的《连续调与单字调的连续性:以山西省的分布为例》,通过使用单字调调形地图,加上绘制单调调类的分合与连续调的调形及分合情况,讨论了山西省的单字调与连续调之间的分布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铃木史己的《现代汉语“外来成分”的地理变异与其成立过程——以马铃薯、甘薯、西红柿、肥皂为例》一文,利用语言地理学的理论,以“西红柿”、“马铃薯”、“甘薯”、“肥皂”等词为例,考察了外来事物“描写借词”在汉语中传播的地域差异和形成过程。复旦大学中文系唐珂的《格雷马斯符号学视野下的“抒情小

说”——以苏曼殊的小说为例》一文,运用格雷马斯符号学理论对“抒情小说”进行了重新认识和界定,并对苏曼殊小说进行了分析。

第八场报告“艺术、仪式与信仰”由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白若思主持。五篇文章分别从墓葬、祭祀、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了讨论。文史研究院周洁的《对四川汉晋墓阙建筑、图像与空间的再讨论》一文,以四川汉晋墓阙实物与阙形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推导墓阙建筑从三维空间构成到二维阙形图像之间,由形式组合带来的意义变化。历史系胡耀飞的《佛道鬼神:唐宋之际扬州民间信仰考察》一文,关注唐末五代扬州一地的民间信仰。作者指出,唐宋易代之际的扬州地区,交通便利,商贾云集,杂陈的信仰以各种形式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文史研究院胡嘉麟的《宗祀与道祀:宋元时期的祭器礼仪——以浏阳文靖书院为例》一文,考察了宋代著名理学家杨时的浏阳文靖书院的祭祀礼器。作者从实物和文献的关系出发,结合宗祠和学祠制度下的祭器和陶仿祭器,探讨宋元时期不同系统所推行的礼制和礼学体系。文史研究院庄程恒的《庆堂与净土:金代墓葬婴戏图像及其多种信仰》一文,以婴戏题材出现较为集中的山西南部地区金代墓葬为例,借助对墓葬装饰中各类题材的整体观察,分析其相互关联,并讨论图像在墓葬中的意义及相关信仰诉求。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莉的《从黑龙神崇拜到忠义祠堂——安徽无为螺矶孙夫人庙传说考析》,探讨了刘备之妻孙夫人传说信仰的发展及演变。作者通过考察当地地方志和相关文献指出,被称为梟姬祠的灵泽夫人庙一开始并非祭祀孙夫人,而是祭祀黑龙神,到了明代,随着《三国演义》和三国话本流传,孙夫人殉夫投江的传说逐渐流传,最终在成化年间,官方封灵泽夫人为昭烈孙夫人,最终成为正式信仰。

在短暂而又充实的一天半会议日程中,参会的中、日年轻学者就论题进行了密切深入的交流,大家得以了解到他人的研究取向和研究视角,并从老师的点评中收获颇多。□

王皓、徐艺恒、朱小巧 撰文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行记

邓 菲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2014年1月4日至2月10日,我作为访问学者应邀前往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受到了所长大木康教授与羽田正教授、板仓圣哲教授、平势隆郎教授、张馨元特任研究员以及相关人员的盛情款待,并参与了所内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收获良多。

此次日本之行最主要的目的是收集我目前研究的相关资料。最近,我的研究主要围绕11—14世纪东亚的物质文化交流展开。具体而言,一是关于图像与器物在东亚范围内的流转;二是通过装饰性题材的传播所反映的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访问时间较为有限,我主要选择日本学者在该方面的研究成果作为收集对象,充分利用了东京大学的图书馆系统。另外,受到板仓圣哲教授的邀请,我还参观了东洋文化研究所以及文学部的东亚美术方向的研究室与图书馆,对东京大学的东亚艺术史有了大致的了解。

东洋文化研究所东亚美术部的前身是东方文化学院的美术考古学部,自成立以来,由米泽嘉圃、铃木敬、户田祯佑、小川裕充、板仓圣哲历任教授,是日本东亚艺术学界最为重要的研究阵营。在铃木敬教授、户田祯佑教授的倡导和推动下,东洋文化研究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中国绘画的调查工作,调查成果以图版目录的形式编为《中国绘画总合图

录》(三编)。该图录在文物出版社《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书画图录》的基础上编录了海外所藏的大量中国绘画,依各博物馆所藏分类编列,并收录有许多日本寺院与个人所藏的书画艺术品,为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资料目录与集成。



东京国立博物馆

除了资料的收集,我还与相关学者进行了不同主题的交流与探讨。在访问期间内,我分别在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教授召集的“人文学科的新视野”读书班上做两次学术报告,以《図像の復古と再造——宋金元喪葬芸術における「孝子」画像》与“Realms Beyond: Half-open Doors in Burial”为讨论题目,与大木康所长、平势隆郎教授、羽田正教授、鹤饲敦子博士、Birgit Tremml-Werner博士等学者就报告主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在平势隆郎教授的邀请下,我还参观了东洋文化研



究所所藏的中国大陆调查资料。20 世纪初以来,日本学者及个人在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下,对中国各地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例如山本赞七郎在 20 世纪初所拍摄的写真,以及关野贞、常盘大定进行的《支那文化史迹》调查等,这些考察资料既涉及当时中国的风貌、民俗,同时也对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和研究,而且大部分资料至今未在日本以外的地区出版发行,所以具有十分宝贵的史料意义。山本赞七郎、关野贞、竹岛卓一等人所留存的大部分照片都捐赠给了东洋文化研究所,或由其保管。在参观之后,我与平势隆郎教授、法政大学的盐泽裕仁教授就关野贞、竹岛卓一等人的调查足迹与有关资料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探讨。

对我来说,此次访问东京大学,除了上述的资料收集与学术合作外,最大的收获是对东京及关西地区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博物馆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承蒙板仓圣哲教授的热情邀请,我随他一同前往东京国立博物馆参加“クリーブランド美術館展—名画でたどる日本の美”与“日本伝統工芸展 60 回記念”特别展览的开幕式,并由此结识了博物馆界内的多位研究人员。东京国立博物馆于 1872 年创建,原为文部省博物馆,由 4 个展馆组成,藏品近 11 万件。其中本馆设有 20 个陈列室,按时代展出日本雕刻、染织、金工、书画、陶瓷等展品。上述两个特别展览正是在本馆中展出,且在展品及陈设等方面颇获好评。

东京国立博物馆还包括展出史前时代至历史时代日本考古发现的“表庆馆”、陈列法隆寺向宫廷献纳各种宝物的“法隆寺宝物馆”。另外,我最感兴趣的是综合陈列西亚、中亚、东南亚艺术及中国、朝鲜艺术等的“东洋馆”,一方面是由于它的收藏范围非常广,涉及亚洲范围内各个时代的重要文物;另一方面,则由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是目前日本收藏中国文物最为丰富的博物馆,展出的中国艺术品分为 5 个陈列室,展品包括史前彩陶、商周青铜器、汉代画像石、魏晋南北朝的佛像、唐代的金银器、宋元明清的瓷器和书画等。仅在宋元时代的绘画中,就藏有《潇湘卧游图卷》、《红白芙蓉图》、梁楷《雪景山水图》等国宝级艺术品。

日本所藏的中国重要文物不少是由平安时代以来



根津美术馆

的中日文化交流所得,并一直保存至今。另外,由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在有计划地收藏中国文物,所以现在全日本的 1000 多座公立、私立博物馆、美术馆,几乎都藏有中国的文物。除了收藏最为丰富的东京国立博物馆外,还有大仓集古馆、静嘉堂文库美术馆、根津美术馆、出光美术馆、白鹤美术馆等各有特色的著名展馆。我在此次访问内参观了包括根津美术馆、出光美术馆、大和文化馆等在内的 9 座博物馆。其中根津美术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根津美术馆由号称“青山茶人”的东武铁路创办人根津嘉一郎在 1940 年兴建,展出了根津嘉一郎收集的以古代美术品和茶器为中心的 7000 件艺术品,以茶道用具和佛教美术作品著称。同时,根津美术馆内还收藏有中国古代青铜器、佛像、瓷器、书画等,不仅展品数量多,门类也十分丰富。根津所收藏的商周青铜器大多是于河南等地的古墓出土后,于 20 世纪 20、30 年代流入日本的。馆内所藏佛像也非常精美,不少来自于山西天龙山石窟,如北齐如来头像、唐代菩萨头像等。根津美术馆的另外一个看点在于它的曲径通幽。该馆位于以时尚、设计街著称的表参道区域内,但整体的建筑是以大自然为主题的日本式庭园,绿树成荫、幽静异常。在东京寸土寸金的商业中心,竟然隐藏着一个出世之境,可以使人在很短距离之内洗清浮尘,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实在难得。

学术交流、馆藏利用、资料收集,使我对日本的东亚美术学界有了初步的认识,收获颇丰。另外,日本各位师友的热情接待,也使我在学术之余增添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为此,我要向此次访日期间帮助我的各位前辈、同仁,特别是羽田正教授、大木康教授、板仓圣哲教授、张馨元特任研究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

滋贺县高月町芳洲文库访书记

朱莉丽

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芳洲文库,是以江户时代日本对马藩负责对朝外交的儒官雨森芳洲的名字命名的文库。雨森芳洲,对于研治中国史的学者而言,也许并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但其在日本和朝鲜的外交史上,却是一个写下浓重一笔的人物。雨森芳洲作为江户前期对马藩的文官,曾长期致力于沟通日本与朝鲜的友好往来,他所提出的“诚信外交”的理念,与作为其同门的江户著名外交家新井白石强势外交的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可以说是江户时代日本处理对朝外交时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理念,也是在相当大程度上对立着的两种理念。师出同门的芳洲和白石,之所以在外交理念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与其说是个人性格的不同,不如说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处于江户幕府权力中心的新井白石,和处在对朝外交第一线的雨森芳洲,对于当时日本处理对朝外交时所应采取的态度和策略,有着截然不同的体会和看法。

雨森芳洲,1668年出生于近江国伊香郡雨森村,即现在滋贺县长浜市高月町雨森,父亲是一名医生。12岁的时候,芳洲赴京都学习医学,18岁前往江户,拜于当时著名的朱子学者木下顺庵门下学习。他的同门中,涌现出新井白石、室鸠巢、祈园南海等著名的儒学者。应该说,在雨森芳洲在世的年代,他的声名是无法

和白石等人相提并论的。与始终处在权力中央,并作为江户幕府外交政策决策者的新井白石不同,雨森芳洲在1692年的时候,便经由老师木下顺庵的推荐,前往地处边陲却是对朝贸易和外交窗口的对马藩担任儒官。在赴任之前,芳洲特地前往长崎跟随唐通事学习了汉语,这为他接下来更好地协助对马藩进行对朝外交打下了基础。

1702年,当时在对马藩担任朝鲜担当部补佐役的雨森芳洲前往设在朝鲜釜山的日本人居留地——倭馆学习朝鲜语。这期间,芳洲一方面协助朝鲜编订了日语辞典《倭语类解》,一方面撰写了名为《交邻须知》的朝鲜语入门书,表现出对朝外交的极度

热忱和重视。当时,为了沟通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外交关系,每逢德川幕府新将军就任,朝鲜便会向日本派出通信使以示庆贺。雨森芳洲曾经陪同正德元年(1711年)和享保四年(1719年)的通信使前往江户,并与使



《交邻提醒》



团成员进行了活跃的交流。雨森芳洲将自己及其他江戸儒者与正德度通信使唱和的诗作编订成《缟纈风雅集》以及《附集》，同时还撰写了许多研究朝鲜及讨论对朝政策的专论。因此，对朝外交的相关史料，成为芳洲文库藏书最具特色的一个部分，也是我此次访书之行的动因所在。文库的藏书，目前都收藏在雨森芳洲出生地——滋贺高月町的观音里历史民俗资料馆内。

其实，在此之前，经雨森芳洲及其后代之手搜集的日朝关系史料及其他资料，一直都由雨森芳洲的后人代代相传地保存着。直到大正十五年的秋天，为了使这些珍贵的史料得到更加完善的保存，以及可以为更多的人所研究利用，雨森芳洲的十代孙雨森秀树将之赠送给高月町大字雨森的芳洲会。但与芳洲生前功绩的不显赫相对应，其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人都未曾注意到在江户时代的日朝交涉史上有这样一个为了推动两国的友好交往而默默耕耘的人，芳洲会的雨森芳洲关系史料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1990年，时任韩国总统的卢太愚在访日公开演讲时，提到雨森芳洲这一沟通朝日友好关系的先驱，雨森芳洲的名字才为更多的日本人所熟知，也使得这一史料群开始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

1991年，也就是卢太愚访日的次年，滋贺县教育委员会着手对芳洲会保管的芳洲关系史料进行调查和整理。经过为期三年的工作，一个涉及江户时代学术、思想、外交、汉学、书信、书法、家谱等诸多领域的庞大史料群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次调查，共整理出258种455件的资料，这里面不仅包括雨森芳洲在世时的作品和收藏，还有其长子、次子、三子以及孙辈们进行转写和添加的史料。因此芳洲文库中史料所涉及的时代，并不仅限于雨森芳洲生前，也有在大正年间撰作的史料。

从京都大学乘火车前往收藏着芳洲文库史料的滋贺县长浜市高月町的观音里历史民俗资料馆，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滋贺与京都毗邻，境内有着日本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分布着古坟时代的许多大规模古坟，是律令时代美丽的近江国。但今天的滋贺县在日本的地位，也许可以概括为一个产粮大县或者关西地区主要的农产品供应地。在从京都坐琵琶湖线前往滋贺县长浜市的一路上，车窗两侧的风景，一边是绿油

油的农田中点缀着笔直的烟囱，远处有起伏的山陵；另一边则是湛蓝的琵琶湖水在阳光下散发着粼粼银光。与毗邻的京都因为世界遗产众多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者不同，滋贺县除了美丽的琵琶湖和湖上的冲浪运动吸引着一些游客不时前来之外，极少有外地观光客的身影，更不要说是外国人了。尤其是长浜市因为山地众多，资源匮乏，是滋贺县相对贫穷的地区。而高月町却因为接纳了诸多大企业在此建造工厂，地方财政相对宽裕，成为长浜市数一数二的富裕地区。从高月站出来，沿着一条宽阔的公路走不太远，转两个弯便进入一片居民住宅区，观音里历史民俗资料馆就隐藏在这一片由一座座独立的小二层住宅组成的居民区里。这里之所以叫做观音里，是因为小小的高月町保存了平安时代以来的130座观音造像，是观音信仰浓厚的地区。负责接待我的，是之前一直通过邮件联系的资料馆副参事佐佐木悦也先生。



《京都唱酬》

当我向佐佐木先生说明了自己寻访通信使资料的来意时，佐佐木先生便热心地向我介绍了芳洲会所藏资料的来源和构成，并拿给我一本雨森芳洲关系资料调查报告书。调查书里不但对芳洲文库所囊括的史料进行了逐一介绍，还有参与整理工作的相关人员对资料整理过程的介绍及对史料整体性质的分析。文库中与朝鲜通信使相关的史料，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由雨森芳洲亲自编订的《缟纈风雅集》以及《附集》外，还有：《京都唱酬》，乃五山禅僧与山与正德元年（1711年）通信使制述官李东郭，书记洪镜湖、南泛叟，以及大松山人瑞应与李东郭唱酬的合集。《韩客唱和集》，系李东郭、南泛叟、洪镜湖与日本文士唱和的作品和书信，也包括双方针对医学、风俗、植物、音乐等领域的笔谈资料。《韩使五山唱和集》，系正德元年通信使与伴送他们前往江户的以酊庵第41代相国寺慈照院别宗祖缘、第46代建仁寺永源庵云壑永集一路上的唱酬之作。以酊庵是



设在对马藩的寺院,从宽永2年(1635年)开始,江户幕府每隔一年或两年轮流向以酹庵派遣五山中汉学修养深厚的僧人,以负责对朝外交文书的制作以及与通信使等朝鲜使节进行接洽,监视对朝贸易等。这一作品中的诗作同时收录到了上述《缙绅风雅集》的第十一卷以及《附集》的第三卷中。《三宅沧溟·朝鲜通信使一行诗文笔谈集》,则是播磨人三宅沧溟(直栋)与正德度通信使诗文笔谈的誊写稿。《朝鲜使节东槎纪行》,是明历元年(1655年)为庆贺德川幕府四代将军袭职来日的朝鲜通信使一行,与负责伴送的建仁寺大统院九岩中达、清住院茂源绍柏两僧的唱和集,同时也收录了通信使与大学头林罗山、其子林鹅峰、其孙林春信(其时十三岁)以及其他儒学者的唱酬之作。《附韩人文·广陵问槎录》两册,前册为享保四年(1719年)来日的通信使申维瀚、姜栢、成梦良的诗稿,后册为广岛儒官寺田临川与正德元年来日的李东郭、洪镜湖、严龙湖、南泛叟等通信使的笔谈记录。此外还有申维瀚、李东郭等朝鲜通信使的诗作《唐金氏宛申维瀚诗文》、《李东郭七绝〈游仙诗〉》等。

除了唱和集之外,芳洲文库中还包括其他种类的朝鲜关系史料。如雨森芳洲总结对朝外交心得的《交邻提醒》,是其61岁时献给当时的对马藩主宗义诚的对朝外交倡议书。主张要在了解朝鲜风俗,尊重彼此不同的基础上,抛弃偏见与蔑视,以至诚之心开展对朝外交,是雨森芳洲对自己对朝外交经验的总结之作。《国书书改总论》,记录了正德元年朝鲜通信使在江户时,新井白石针对通信使所携国书中没有避德川家光的“光”字之讳而强令信使修正之事的经过,并附有新井白石的论说。在芳洲的文集《橘窗文集》中,收录有一篇名为《论国王事与某人书并跋》的文章,记录了正德元年通信使来聘时,雨森芳洲与新井白石围绕将军国王号问题进行的论争。以上三部史料都是雨森芳洲亲自著录的。除此以外,也有他人撰述的对朝关系论著。比如《朝鲜事情等杂录》,是以朝鲜与清朝之间的事大关系为背景的朝鲜政情杂录。《以酹庵使僧纪行

诗》,则是从京都往对马以酹庵赴任的五山僧们的纪行诗,其撰作年代不详。此外还有日朝两方因各种外交事宜往来的书翰等材料,包括朝鲜国王李吟给德川家重的国书,朝鲜国王李焞给德川吉宗的国书等。

除了对朝外交的相关资料,文库中还收录有许多介绍朝鲜国情和风土人情的著作。如《朝鲜物语》,系江户时代人木村理卫门所著。共五卷。第一卷是对古代日朝关系的记述。第二卷记录丰臣秀吉的朝鲜侵略。第三、四卷记录了越前国的行船人漂流到鞆鞆,经朝鲜回国的经历。卷五介绍了朝鲜的地名、官名和语言等。《朝鲜风俗记》,是雨森芳洲呈递给当时担任德川幕府大学头的林罗山的关于朝鲜历史和现状的研究著作。其中提到朝鲜不但是礼仪之国,而且武器装备精良,拥有大量的铁炮,决不能将其视为弱国。《朝鲜文人诗集》,则是作为通信使来日的朝鲜人经过自国境内时对沿途景物有感而发的诗作集,咏叹的对象包括朝鲜金泉、金山、礼泉县等地名以及齐民楼、白沙亭、望岳楼、见佛寺、观音浦等名胜古迹,共收录了四十四人所作的六十六首诗。

虽然我此行的目的在于寻访朝鲜通信使相关资料,对芳洲文库的了解也主要限于其中的对朝关系史料。但很显然,芳洲文库的近三百种史料中,对朝关系史料仅仅是其中一个部分。这一史料群中还有着许多关于江户时代的儒学、文学、礼仪的珍贵记录以及雨森芳洲家族的关系史料,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江户时代的日本政情和文化的钥匙。

当我踏着暮色坐上返回京都的列车,回味起这半日的访书之旅,不禁感慨万千。偏远难寻的芳洲文库就这样静静地坐落在高月町这个安静的小镇上,雨森芳洲就是从这个群山环绕的乡村走向了京都、江户,其最后的落脚点,则是四周大海茫茫的对马藩。从群山走向海洋,他的世界变得更加开阔。也许正是这种特殊的经历,造就了雨森芳洲宽广的胸怀。“诚信外交”的理念彰显了其作为外交实践家的远见卓识。而他的思想,则通过芳洲文库中的著述传达给了后世的人们。□

清代举子之旅

——从广东到北京

大木康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

演讲人简介：

大木康教授，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专攻中国明清文学、明清江南社会文化史。主要著作有：《冯梦龙〈山歌〉研究》（2003）、《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2004）、《风月秦淮：中国遊里空间》（2006）、《冒襄与〈影梅庵忆语〉研究》（2010）等。



过去中国的诗人很多是官僚，他们旅行的机会不少，而且每到一处就要作诗。松浦友久教授称之为“诗迹”，就是供作诗的名迹，比如赤壁。中国诗人一般是在现场作诗，而日本平安时代的歌人则大多是住在京都的贵族，他们的和歌中有不少是歌咏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叫作“歌枕”（うたまくら），是想象的名胜古迹。在这种差异下，我对中国诗人的旅行开始产生兴趣。

过去有关旅行情况的资料，第一是诗文集，第二是诗总集，特别是以“诗迹”编成的总集。此外还有地方志的艺文部和游记，或是史部地理类的游记、纪程、路程、总记之属。另外还有日记和年谱，比如阮元年谱保

存了从北京赴任两广总督的每日的记录，这是很好的材料。第七是商业书。明代后期，一方面旅行的人比以前多，另一方面出版业相当发达，所以出现了不少商人的旅行指南，其中有不少关于旅行的内容。

但这些资料还不够，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的情况，就像现在机票在哪里买、到了机场要办什么手续等等。这些属于一般常识，一般来讲，越平常的知识越缺少文字材料。《燕行录》也是很好的材料，因为写《燕行录》的都是外国人，对中国人而言的一般常识，对他们来说是新奇的见闻。另外，有关旅行的细节，包括交通工具、住宿、用餐、携带物品、旅费、旅行中遇到的困难、犯罪、旅行中的娱乐等；以及在以前没有普及普通话的情



况下,他们的语言问题怎么解决? 还有人和人的关系、择日、地图等等。

我想用“士农工商”的概念来考察明清时期出游者的情况。第一是农民,当时的农民一般很少有机会去远游,他们是生活在某个特定方言世界的人。根据 William Skinner 的市场圈模式,明清时期的农民从乡村到镇上买东西,一般去的最远的是县城。我曾在江西南丰县的一个乡村调查傩戏,当地农民在农闲时会出去表演,北到宜黄、南城,南到广昌,东到黎川、建宁,基本上是以南丰为中心五十公里以内。这属于以南丰为中心的一个方言圈,他们的活动范围——曲艺圈和方言圈——是完全一致的。



江西南丰县某村傩戏演出的活动范围

实际上,明清时代移动最多的是“士”和“商”,“士”指的是考生、官僚或幕客,“商”主要指的是客商。在旅行书籍中,也有题名为《士商必要》这一类的书。冯梦龙“三言”中有一篇《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故事中就有徽商和粤商之间的矛盾,而这个故事发生在湖南。另外,科举制度也可以说是一种旅行的制度,考生先在县城考童试,考上了就去大城市应乡试,乡试考上了就是举人,全国各地的举人都要去北京应会试。如果考上了继续当官,还要出外任地方官。所以明清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从自己的家乡一层一层到达北京,再从北京到某地当官,他们旅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我一直在找有关旅行的具体资料,偶然发现了林伯桐写的《公车见闻录》。林伯桐出生于乾隆三十九年,道光二十四年去世,广东番禺县人,嘉庆六年 27 岁的时候考中举人,最后在嘉庆二十一年 42 岁时到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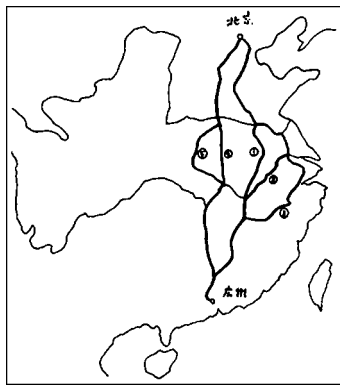
参加会试,同年父亲去世。之后他不再应试,专心于读书著述。嘉庆二十五年阮元到广州做两广总督,开设了有名的学海堂,林伯桐被选为学长,所以他的文章很多见于《学海堂集》。他于道光二十四年 70 岁时,任德庆州学正,当了一个小官,但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林伯桐是一位精通《诗》、《礼》的学者,著作很多,有《毛诗识小》、《毛诗通考》等,《番禺县志》列传中有他的传。《公车见闻录》一卷篇幅不大,是道光十九年他还活着的时候由他的学生整理刊刻的。序文里说,《公车见闻录》原来是以抄本形式流通,后来要看的人多了就刊刻出版了,当时刊刻出版的书很多都是这样的情况。《公车见闻录》现已收在《修本堂丛书》,这是收集林伯桐个人著述的一套丛书,在日本只有东北大学和东大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最近台湾出的《丛书集成新编》中也影印了台湾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版本。《公车见闻录》一卷分有十个章段:约帮、就道、行舟、升车、度山、出关、工仆、用物、养生、至都。

第一个是约帮。“凡北上者,以约帮为重。盖万里同行,逾年相聚,自早至暮,咫尺不离。其无形之濡染,不仅如香篆之熏衣也。《易》曰,出门同人,此为第一义矣。”可以知道当时广东人去北京应考,是结起帮来租一个船,大概当时雇船不怎么便宜。“帮友亦不必太多。大约四人同舟,两人同车为通行常例。若两人同帮,则必甚相得者乃不寂寞。”如果只有两个人,性格矛盾就很麻烦,因为好几十天从早到晚在一起,所以一定要“甚相得者”。“至五六人同帮,合为一船,则逼仄,且行李必错杂”,所以还是四个人最合适。五六个人“分为两船则多费”,“饮食难照应”,八人以上就“必须分为两船。人数既多,仆从亦众,瞻前顾后,意见纷歧,似不若简之为愈”。

关于“就道”：“吾粤北上之路,其常行者凡五。”有沙井路、长江路、中江路、汉口路、樊城路。据说沙井路最快,车多船少,需七十天。中江路坐船比较多,也差不多要三个月。所以当时人从广东到北京,最快也要七十多天,最慢的三个月。当时会试要求三月九号一定要报到,所以广东的考生一定要在春节前后启程。

“行舟”是雇船时要注意的地方。“雇船者要船身完好明洁。问行船用几人,问船内何处住容。”这个很



清中期广州至北京的五条路线

有意思：“令掀开船板，看舱内安顿衣箱之处要爽洁，问何处备客炊爨。令船户逐一指认，分定界限，以免混杂。”这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买机票的时候无法确认椅子干净不干净，或者飞机有没有问题。还有关于价钱的：“先交船价若干，余价为包封，写明，船至某处，交包封若干，至某处又交包封若干，至某处然后交完”等等。如果“途中船户求借，以船票示之，彼觉词屈，亦不能多求也”。

路上换马车的时候，就是“升车”。广东人习惯“乘肩舆，骤闻登车，多有畏心。其实大河以北，妇人孺子亦能乘车远行，并能骑驴代步，必非难事可知”。另外，坐船可以在船上睡觉，但是坐马车则一定要住旅馆。“凡车将到站，先要着人看店。若是日在路上见车甚多，则住店难得。须预先数十里，着人雇小驴，驰往前路，打店以待。或计是日到站已夜，恐难觅店，亦须如此。”还有很有趣的地方：“每晚在店中，晚饭毕，即将店钱算明结完，并预备酒钱。次早洗面饮茶后，赏以酒钱，即可登车矣。”刚才是 check-in 的情况，早上 check-out 如果有很多人排队结账，就会耽误时间，所以每晚吃完晚饭马上就要把账结掉。

有时候一定要用人力爬山，就是“度山”。“舟行将近度山，即有涉水远来，迎请人行者，可婉辞之。”就像现在一样，运输公司的人会提前派人来下船的地方

招客。“问夫价轿价，若在其行，说价已合，行内即发夫往舟中搬行李，谓之上河。”下船的时候，自己的行李要叫他们来搬。“行中报云行李到齐了，即照号数一一点明。”运输公司说行李都齐了，他还是要一一点明。“其皮箱内有路费者，可一开视。”如果在箱子里放钱的人，还要打开确认。

还有养生。“昔人有言，万里之外以身为本，故调摄为北游先务。而读书犹次焉。饮食者又调摄之要事也。”他们到北京是为了科举，但是旅途中还是身体健康最重要，不能太拼命看书。

还有出关、工仆等。当时出去旅行，要经过好几个关口，官员要检查，书里写道，还是遵照官方的要求更为顺利，不要故意隐藏自己的东西，反而麻烦。还有工仆：“盖数千里外日用起居，皆资健仆，其人不足靠，安得呼应之灵，必用当其才乃臂指之效。”还有“用物”：“船中桅头之旗，写奉旨会试四字。或父兄本有官衔，即写其官衔亦可。”当时举人到北京应考可以说已经是一种官方的旅行，所以传统上可以写“奉旨会试”四个字。另外，虽然《公车见闻录》里没有记载，不过当时的科场条例是给每个举人发一笔旅费，每个人几两银子，但是绝对不够。

最后是“至都”，也就是到北京的一段。因为很多人住在广州会馆，这部分是关于怎么登记之类。

在光绪年间还有一本李虹若的《朝市丛载》，这本书可以称为一本“北京生活手册”。《朝市丛载》卷一是有关“品级、衙署”，这是有关北京官府的记载；“国朝鼎甲录”，有关科举；卷三是“会馆、客店”等等；卷四是“风俗、行程、路程、风暴”；第五是“汇号、宴会、文具书画、服用、食品”；还有北京的“古迹、时尚、戏园、戏班”等。

总之，通过林伯桐、李虹若等人的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旅行的一般情况。□

周语 整理

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耶鲁大学荣誉教授

郑培凯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

演讲人简介: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耶鲁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研究领域为近现代中国史、中西关系史、中国法制史等。著有《追寻现代中国》、《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曹寅与康熙》、《改变中国:在华西方顾问》、《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胡若望的疑问》等多种。

郑培凯,耶鲁大学博士,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首任主任,现任客座教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为中国文化意识史。著有《汤显祖与晚明文化》、《真理愈辩愈昏》、《流觞曲水的感怀》、《树倒猢猻散之后》、《雅言与俗语》、《迷死人的故事》、《品味的记忆》等。

郑培凯:今天这场讨论的核心议题,就是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当然,也不仅局限于此,而是希望以此来回顾如何反省中国的历史,怎样呈现中国的历史,怎么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史景迁先生而言,作为一个英国人,在美国教了一辈子书,他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在此,我想问问史先生,您在撰写这些有关中国的历史人物的研究著作时,思考的问题什么?您试图通过这些人物来传达什么?又是如何来呈现这些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的?



史景迁:谢谢您的问题。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开始时也并不十分清楚问题的答案。青年时代在英国求学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史,尤其是有着四百年传统的英国宪法史。直到我来到耶鲁大学读研究生之后,因为要学习很多课程,才开始接触到中国的研究。由此,我意识到,汉学为我开启了一个有魅力而又非常困难的领域。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渐渐确定了要研究的论题,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并将其出版。

我想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在此过程中,有很多的意



外与偶然。一开始,我并不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只是由于在有关中国的材料中,发现了同英国的斯图尔特王朝时期所面临的相似的问题,诸如如何维系统治,如何镇压叛乱等等,才对此发生了兴趣。一些与康熙相关的材料,让我意识到他在面对这样一个伟大帝国时所展现的雄才大略。他的满洲背景,更让其在处理帝国事务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特别。1959年,我前往澳大利亚,见到了一位很优秀的学者——房兆楹先生。正是他引导我用古典文献学的方法来解读史料,也构成了我写作《曹寅与康熙》一书的缘起。在台湾,我看到了当时还未公开的朱批谕旨。在那些上奏的人物之中,有一位便是曹寅。渐渐地,我感到应该写一篇讨论康熙的论文,并试图尽可能地展现那一时代非常复杂的不同面向,这便是我博士论文的缘起。

当我试图对此进行探讨时,又牵涉到很多相关的问题。我们要想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就必须了解他所处的周边环境,乃至整个社会的性质。曹寅,这位来自满洲的包衣,虽然是清廷的奴仆,却在内务府中担任要职。他的家族,是如何在帝国中求生存的呢?透过已有的史料,来处理这些已经逝去的历史人物,的确是我探索和研究问题的方式。在读到康熙对全国各地所呈奏折的朱批时,我意识到,正如同当时的我一样,他也在学习中文,也会犯错误。这是他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我又继续思考,将问题延伸到更为广泛的领域,作为统治者,康熙必须面临敌对势力对政权的攻击。从围绕四书等儒家经典的争论,到他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接受,所有这些都萦绕在我的脑海,促使我去寻找更多的材料和讯息。然而,当我真正开始全面地研究这位帝王之时,有些问题是我未曾预见到的。例如,面对吴三桂的叛乱,他不得不进行一场赌博,可能赢,也可能输。同俄国的境界冲突以及台湾和西藏的问题,也同样如此。当时的帝国,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对康熙而言,他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另一个问题是耶稣会的传教士。随着西方人不断来到中国,他们对这个国度也发生了兴趣。这些外国

人会如何看待中国?这便引发了我另一条研究线索,即希望勾勒出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他们做了什么,还希望做什么?又对当时中国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怎样的作用和影响?这便是我撰写《改变中国》(*To Change China*)一书的原因。随着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来华,传教士们进入了中国的宫廷。他们生活于此,并开始用中文写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对他们而言,如何消弭误解,成为必须要面对的课题。19世纪,欧洲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到了20世纪,西方工程技术、教育方式的引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许多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的进步。随后,又有美国在二战时期对中国事务的介入,乃至上世纪50年代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各种不同的外国人士,试图从不同的维度来改变中国,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条线索,便是从我最初对康熙的关注开始的。

应该说,我对于康熙的研究,是从一些大事件开始的。但由此,我也会想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即那些贫困潦倒,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人。又是缘于偶然的际遇,我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看到了清人黄六鸿所作的《福惠全书》。这里头都是一些案例,其中即有一个有关“王氏之死”的案子,还有验尸的报告。这是很具体的材料,我就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事件。虽然这个王氏连名字也没有,但我还是会想,她所处的整个环境是怎样的?到底为何而死?当然,这里有想象的成分,但这种想象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的。

我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同宗教相关的。这其中,还有中西文化碰撞所引发的问题。除前面谈到的利玛窦等人之外,我探索此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则是胡若望。他在广州信了基督教,便想要跟着传教士到巴黎去,可谓计划周详,他想要了解当时的欧洲是什么样子。然而,当他到达巴黎时,却根本适应不了当地的环境。他的所作所为,几乎与疯子无异,最后被法国警察当作一个疯人,关到疯人院里去了。所幸,法国当局认为他并没有犯什么罪,不知如何处理,便将他送回了中国。胡若望的疑惑,也是我心中的疑惑。在此过程中,究竟有着怎样的一种文化碰撞?这便是《胡若望的疑问》一书的由来。



郑培凯:之后,就是有关太平天国的这本书。到了洪秀全这里,基督教在中国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扭曲,造成了如此大的一个事件。在洪秀全看来,他属于上帝的家族,是耶稣的弟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他疯了。但是,在这种疯狂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动因?我想要问的,便是您有了文献之后——大家也接触到这些文献——面对同样的文献,您为什么会这样思考呢?

史景迁:在历史书写和历史想象的过程中,很多材料大家也都看到了。例如雍正,他写了一本《大义觉迷录》。这份材料十分详细,你能从中看到很多东西。对于中国的历史,我们要从不同的层次上来解读,一般的理解要有,更要注意发掘其深层次的东西。只有这样,无论贩夫走卒,还是游方道士,只要能够将其同自己已知的东西相联系,便能更加深入地去解读历史。有的时候,当我们掌握了一些具体而清晰的细节,这些细节又是他人所不曾措意的,便应该把它同更宏观的东西联系起来。由此,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小的事件,就变得很有意义,能够丰富我们对于整个历史的理解。曹寅、康熙、胡若望的例子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历史研究的方法,至少是我的方法。

金安平:由史景迁先生的治学经历,我联想到艾默生讲过的一句非常极端的话。他说:“一切历史都是传记”。换言之,一切历史都应该以传记的方式展开。正如史景迁先生所研究的,无论大人物、小人物,他们的心态,始终是史先生关注的重点。所谓心态的考察,其实就是传记,例如《康熙》那本书,其实就是一幅“自画像”。而且,谈到一个人的境遇,就必然牵涉到其所处

的环境。根据我的理解,史先生写作历史的动机就在于此,这恰是艾默生最欣赏的一种书写历史的方式。还有一点,就是西方人写中国历史时遇到的困难。在这一点上,我从史先生那里学到了一点。他常常说: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要用最好的方式把问题说得很明确,同时,不要使用太多的人名、地名,因为西方人无法“抓住”这些名字,会被弄得糊里糊涂。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一种障碍;但反过来说,当你不能再回头去使用这些人名、地名的时候,又该如何讲故事呢?如果你能以一种清楚明白的方式将这段历史呈现出来,这种表达方式,也就不再是一种劣势,反而成为一种优势。

郑培凯:这里的确有一个历史叙述的问题。20世纪,有些历史学家总觉得,只要把资料通通摆上去,就是最好的历史。而在史先生看来,历史叙述本身是值得重视的,文体也需要给予格外的关注。史先生的书为什么在西方那么受欢迎,例如《追寻现代中国》一书,至今仍然是英美通用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我的理解,正是在于其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叙述。一个作者,不管是历史家也好,文学家也好,作品带给你的,就是让你知道他的浓厚兴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学历史的人,不是单纯地进入历史这个行业,按部就班,循规蹈矩。这样,写不出好的历史来。从这一点来讲,史先生把他的一生都投入到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叙述,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感召。□

谢一峰 整理

小型学术研究会

(第七十三至七十五场)

遥远的史实,近旁的回响——孔庙历史与遗产漫谈

杨志刚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院长

孔庙历史与遗产的研究,涉及教育史、儒教史、礼制史、建筑史、风俗史等领域。所谓“遥远的史实,近旁的回响”,是强调要走入现场考察和倾听,注重研究方法上的“远近结合”、“远近打通”。这几年我通过对各地孔庙的实地调研,更多地知道了孔庙今天为什么还能保留,如何保留,在这个特殊的场域里过去发生了什么,现在正发生着什么,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的科举、教育、社会文化和近代以来的变迁。

云南大理洱源县凤羽小学的门口,用红漆刷着一幅标语:“教育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2014年春节时我初见这句话,有种时光交错的感觉,心想:这个话或许正是科举时代士子们进出孔庙时最强烈的内心诉求。迈入校门,里面保留着建于清朝雍正四年的凤羽县文庙部分建筑(目前作为校舍使用)。大成殿的土墙上,有不少被抠挖过的痕迹,校长在一旁说明:当地盖新屋,喜欢掺入一点大成殿的墙土,以接获运气和喜气。现在加强了管理,但还是难以完全管住“偷挖”行为。本人尚未搞清这一习俗起源于何时,却不能不感受到在一些民间社会,古旧的孔庙仍葆有一种精神力量。

四川德阳文庙,始建于南宋宁宗开禧二年,目前基

本格局保存完整。在这座孔庙的泮桥旁,我看到一对年轻夫妇正在父母亲友的陪同下抱着婴儿合影留念。从他们灿烂的笑容,可以看到对未来的憧憬。为何选在孔庙和泮桥?因为那里有象征意义。这些年不是还有很多人到孔庙去祈愿吗?祈愿的内容多为学业顺利、考试成功、升入理想的学校。论者或说这属于“迷信”,可在这些行为背后,映射出学生和家长对于社会阶层流动和自我提升的期待,在更深层次上又隐含着对于社会公平机制的盼求。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设计,以及为何一直坚持采用标准化的(乃至呆板的)考试方式,其中包含着对于维护公平的考虑。从今日孔庙的祈愿活动,可以加深对古代科举制度的理解;反过来亦是。由此再来想德阳泮桥旁的那几张笑容,你就可以读出更多的内容。

四川犍为文庙,始建于北宋真宗祥符年间。其大成殿的屋顶非常独特,是一个三重檐的牌楼式建筑。泮池上没有泮桥,据当地人讲是因为当地未出过状元。乐山文庙一度为乐山第二中学使用,现在学校已迁出。仍存泮池,也有泮桥,但被告知,泮桥原本没有,系后来添筑的。原来为什么没有,也是因为当地未出过状元。可见状元情结有多重,并深深融入了地方的民间记忆,



又进而据此去“解读”古代礼制。

云南地区的孔庙兴建于元朝,大量出现在明、清。东北地区的现存孔庙也建于明、清以及民国。把中国各地远远近近的孔庙整理后编排在一起,可以看到古代儒家文化及其所代表的“核心价值观”是怎么扩散、传播出去的。在云南祥云县找寻文庙遗存时,发现在其旁边有一座仓圣宫,供奉着仓颉,还有玉皇大帝、孔子与七十二子、佛陀等,体现出中国民间信仰“兼容并

包”的有趣一面。在大理市挖色镇,还看到了乡孔庙和村孔庙。

在台北孔庙,设有普及传统文化的课堂,每周六、周日上午还要展演雅乐舞。在广东海阳儒学宫,看到了当地祭拜孔子的信俗。考察福建同安文庙时,厦门第二外语中学的师生正在那里举行高考誓师会。这些都体现出孔庙文化最新发展的一些迹象。

通往帝国之路的货币:日本黄金单本位制的确立,1873-1897

Michael Schiltz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文史研究院访问学者

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日本常常是研究近代国家确立金本位制的经典案例。学界对日本确立金本位制的原因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日本1897年加入金本位体系是为了改变了外国投资者对日本的认知,降低借贷成本;另一种认为,金本位制的采用可降低交易成本、减少汇率波动,扩大与金本位制国家的贸易。报告介绍了1850年后的日本经济状况、金融系统的变革,日本银本位的建立以及1897年日本由实际银本位转为金本位的历史背景,重新考察日元同黄金挂钩决策的相关争论,并阐释日本金本位经验的特殊性。

对于“借贷成本”说与“贸易”说的两种论争,报告人指出,金本位制的确立使低成本吸收外国资本成为可能,这种论点在近来的讨论中已被证伪;而金本位制的采用是旨在提高与金本位国家的贸易额的这一论断则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两种观点仅从当代经济学的狭义角度来解读,忽略了对当时日本的政治、历史、地缘等因素的考虑。

19世纪日本货币政策制定有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环境。帝国主义政府对不稳定的亚洲秩序进行干预,这给设立何种金融机构和采取何种货币政策的决策加入了政治考量。从日本现存的大量档案资料可以看到,日本政府进行税制改革后,税收提高,导致公债发行困难,为此,政府吸收外国资本,这成为日



日本讽刺画“金货流出”

本金本位制体系的先决条件。日本走上帝国主义扩张之路后,仅仅凭借本国的货币,增加外国借贷十分困难。这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金本位制由外国大型交易所持股,或是采取在伦敦设有账户的外币储备的形式。这一体系的最终后果是,为支撑金本位制,日本不得不向外国借贷。

讨论日本采用金本位制的原因,必须将其置于19世纪晚期货币政策制定的经济、政治的历史环境中,并重视档案研究与对当时新闻报道的研究。仅重视数据正确而忽视历史背景,往往会得出牵强的结论。(黄飞 译)



葡萄牙中国学研究之路：过去、现状与未来

罗汇(Rui O. Lopes)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美术系博士后

从十五世纪后半叶起,葡萄牙人开始了漫长的航海旅行,开创了航海大发现的时代。我们在讨论葡萄牙对中国学研究的贡献时,不能忽略“东方”和“印度”两个关键词,它们除将亚洲看作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边界以外广袤的地理大陆之外,有时也用以指中国、印度、日本、马六甲等国家和地区。

葡萄牙在亚洲的历史影响深远,对亚洲的记载多为整体概观性的描述,少有对单个国家情况的条分缕析,文献资料也因研究者兴趣不同而各有侧重。首位游历亚洲的葡萄牙人皮莱资(Tomé Pires),在其《东方简志》(*Summa Oriental*, 1515)、《大中国志》(1642)等著述中对当地的风物、教化、宗教、商贸等做了详细的记述。此外还有寄往里斯本的大量信件,包括葡属印度贸易、政治、军事行动等方面的机密文件和传教士的信件往来。这些文献资料包含对中国的重要信息的精确记载,涉及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港口、庙宇、服饰、国画及书法艺术。一些作者还在著述中加入了自身对中国艺术、哲学、宗教、科学及常识的批判性思考。当代著名汉学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葡萄牙侵占澳门,开启了葡萄牙近代汉学研究的帷幕。旅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开始了解中华文明,向西方世界宣传中国的正面形象,中国因此进入欧洲普通民众的视野。在过去数十年中,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葡政府开始致力于推动葡萄牙海外历史的研究,并于1983年创立了葡萄牙海外发现纪念委员会,聚焦葡萄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同时关注葡中双方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1988年成立的东方基金会,致力于促进葡萄牙和澳门地区间的文化、教育、艺术、科技及慈善活动的开展。

1999年澳门回归后又出现了多家机构,如在里斯



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

本设立的澳门办事处致力于澳门地区及中国大陆文化的推广,促进两国在文化、外交及贸易方面的交流。与东方基金会类似的其他机构,如乔治·欧维士基金会(Jorge Álvares Foundation)和澳门之家基金会(Casa de Macau Foundation)的创立同样有利于两国间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除这些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外,还有不少学术团体积极开展中国学研究,其中包括葡萄牙汉学研究所(Instituto Português de Sinologia)和“中国瞭望台”(Observatório da China)。

葡萄牙国内对亚洲研究,特别是中国学研究产生的极大兴趣,这主要得益于两国间联系的历史渊源。葡萄牙档案馆内藏有海量资料,其中包括大量历史记录、传教士的信件往来、商人的贸易报告等。此外,葡萄牙国家图书馆、东方博物馆文献中心、澳门科技文化中心的文献部、阿儒达图书馆(Ajuda Library)、海外历史档案馆、国立东波塔档案馆(Torre do Tombo National Archives)、科学院图书馆及地理学会图书馆等也提供了主要的图书资源。(陈宁阳 译)□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简报

(第三十四至三十五期)

2013年12月23日,“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行第三十四期研习班,文史研究院博士后孙武军发表题为“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象征图像源流辨析”的报告。

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象征表现——双翼日盘,可溯源至埃及,经过赫梯、米坦尼、腓尼基、亚述文明的传播过渡,最终在米底亚王朝落脚,并在米底亚文明的继承者波斯帝国中大放异彩。从埃及到亚述的双翼日盘是各个文明时期神祇的象征表现,其神格并非阿胡拉·马兹达,但在宗教地位、神祇功能等方面与阿胡拉·马兹达存在相似性。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阿胡拉·马兹达神象征图像有三种表现形式:双翼日盘、人首双翼日盘(环)和人首四翼。阿契美尼德王朝是阿胡拉·马兹达神的象征图像最为丰富、发达的时期,不但图像样

式多样,而且载体也包括宫殿浮雕、陵墓浮雕、印章、钱币和耳坠等小物件。其对帕提亚王朝、萨珊王朝、粟特和嚧哒均有深远影响。

作者推测,河南安阳出土的入华粟特人围屏,其石榻底座正中央博山炉上张开双翼的禽鸟形象,应为阿胡拉·马兹达神像。主要的根据有以下几个方面: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的阿胡拉·马兹达神像的双翼传统;萨珊波斯和粟特钱币上的阿胡拉·马兹达神与火坛同时出现的传统;火坛形制的变异与佛教因素;祆教信仰中阿胡拉·马兹达神功能的转变。

从埃及到波斯,双翼日盘形象发生了变异。从波斯到粟特,再到中国,其形象又在发生变化,但其核心特征——双翼,并没有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在从琐罗亚斯德教到祆教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阿胡拉·马兹达神像的功能发生了一定的转变,那就是由君权神授转变为偶像化,同时逐渐远离政治,走向生活习俗。其功能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奉主体发生了变化——从帝王贵族走向普通民众。

本次报告由董少新老师主持,邱轶皓博士评议。与会者围绕报告内容发表了讨论意见,认为此课题时空跨度大,图像资料丰富,对推动中国的伊朗学研究有



埃及“双翼日盘”图像



一定帮助。同时指出,在文字文献资料的运用、入华粟特人墓葬图像与中国宗教和墓葬中双翼鸟形象的比较、香炉与火坛的关系及其与神像组合出现的意义等方面可以进一步深入。

2014年3月27日,“交错的文化史”工作室举办第三十五期研习班,我院特约研究员徐文堪先生作“关于印中语言接触史的一些问题”的主题发言。

古代中国与印欧语系诸群体的接触,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约公元前4500年时,印欧人就已出现在黑海—里海地区,并逐步向东扩散。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族主要分为印度—雅利安语支和伊朗语支,约起源于公元前1900年之后。到了汉代,新疆的绿洲小国被印欧人占据,后世新疆地区出土的非汉语文书,以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为最显著的特征。

一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学和佛学研究 with 汉语史研究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梵汉(印汉)对音方面。1923年,胡适翻译了爱沙尼亚学者钢和泰的名作《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强调研究古译音对于中国音韵沿革史、印度史、中亚史的重要意义。此后,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懈努力,梵汉对音材料的运用成为汉语音韵学研究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文化接触中,传统的汉语音韵学受到印度“声明”的影响。陈寅恪在1934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四声三问》中指出了这一问题。德国探险队在20世纪初于新疆发现的梵文写本中就有语法书 *Kātantra*,还有梵文的《诗律考辨》,梵文赞佛诗也从中古西域传入内地。音韵学研究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近二十年来对汉译佛典语法和词汇的研究。近年来这方面成果颇多,如辛岛静志先生的《正法华经辞典》、《妙法莲华经词典》以及李维琦先生的《佛经释词》等。

此外,徐先生还介绍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倪克鲁(Lukas Nickel)博士最近发表在《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SOAS*)第76卷第3期(2013年)上的论文《秦始皇与中国的雕塑》。该文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先秦雕塑实物还相当少见,人物形象在秦代以前并不是常见的艺术主题,但1974年秦始皇陵墓陪葬坑发现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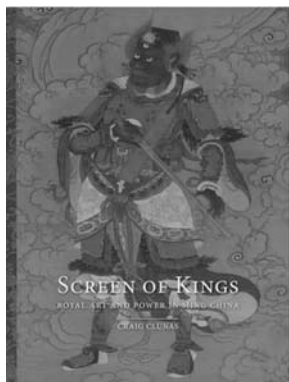
Ai Khanoum 遗址出土的陶塑头像(250-150 BC)

量兵马俑,则与真人等高,细节塑造十分逼真,并被涂上各种色彩和图案,力求陶俑的写实性。在古代希腊和希腊化东方,逼真的人体是几代雕塑家关注的焦点。考虑到中国和希腊化世界很可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已存在联系,当时希腊文化的东缘就是秦朝的邻近地区,即今天的阿富汗和中亚。文章以今阿富汗境内的 Ai Khanoum 遗址、塔吉克斯坦境内的 Takhti Sangin 遗址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 Khalchayan 遗址作为例证,说明亚历山大的东征已经把希腊艺术、哲学和语言带到了上述地区,并且影响到了中国,从而开启了东西交流的新时代。从传世文献可以认定的、著名的秦代十二金人,也可能是秦人以西来的塑像为原型而制作的。因此,如果把秦兵马俑置于当时亚洲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观察,可以认为它们的出现受到了希腊化雕塑艺术的影响。

与会成员对报告主题及所介绍的论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李星明、董少新、邓菲等研究人员都认为应该从全球史角度来认识中国和印度、中国和欧亚大陆之间的语言接触及文化交流问题,以开阔研究视野。邱轶皓博士提到《梵语杂名》中“京师”称为 Khumdan,其实源于古代中亚人和突厥人称呼长安的名称,后来的波斯文史籍中也有类似的名称,根据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的研究,这是汉语的中古音“咸阳”的对音。对于倪克鲁博士的论文,与会者都认为其研究角度富有新意,应该肯定,但提出的论据尚不充分,特别是对兵马俑的制作源于中国本土技术这一点注意不够,因此仍只能视为一个假设,有待今后更深入的研究。□

新 书 介 绍

- 柯律格 (Craig Clunas)《藩王的屏风:明代中国皇族艺术与权力》(*Screen of Kings: 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6 月)



明朝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将太子以外的诸子分封各地,此后始终贯彻分封制度,建立藩屏,夹辅王室,然藩王分封之地都远离江南及长江下游等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无论正史记载还是以往学界的研究,藩王阶层常被作为灰色地带一笔带过。明代藩王是一个处于尊位而不能觊政治的特殊阶层,不少藩王在养尊处优的同时,沉溺于书画、建筑等活动中,对丰富和发展明代的艺术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自 1958 年发现明藩王朱权墓以后,相继又发现十余座藩王墓。作者通过对明代藩王赞助的建筑、书法、绘画、墓葬等艺术形式进行考察,将藩王这一特殊群体置于明代文化和艺术史发展的整体中来考察。

作者不但揭示出许多艺术品的来源,并且展现了前代从未出现或较少出现的艺术品类型。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藩王“奢华”生活的证据,也揭示出,对于明代高雅文化的形成和塑造,王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本书是对明代艺术文化所做的较好的补充。作者从西人的视角,利用方志、杂记、实物等多种材料,对藩王的艺术景观进行研究,不仅分析具体器物 and 书画作品,也从思想层面上探究藩王对佛道的支持。以藩王为核心的艺术赞助,是过去以明代皇族为中心的学术史,及以江南文人雅士为核心的精英艺术以外鲜有学者探讨的地带。

全书共分为七个篇章:第一章“藩屏”;第二章“藩王的景观”;第三章“晋王的书法”;第四章“周王的绘画”;第五章“梁王的珠宝”;第六章“鲁王的青铜”;第七章“记忆中的灯笼”。

此书从艺术史的角度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修正我们对明代权力关系的认知。明代文化不仅是由江南、长江下游等地主导的士人精英文化,规模庞大的宗藩亦建立起了连系中央与地方、贵族与士人之间的桥梁。(周洁 摘译)

• 葛兆光《中国再考：その領域・民族・文化》（岩波书店，2014年2月）



“中国”这一概念，从地域、民族到世界中的定位，一直以来处于含混的状态，所谓“中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历史上，从秦汉到隋唐再到明清诸王朝，都被通称为“中国”；进入现代，从传统的世界观中派生出来的中华民族主义的形态下，“中国”一词又给现实内政、外交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其疆域、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与社会等等，都难以用单一的概念来界定。

从古代“至大无外”的世界观，到宋代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存在，逐渐产生作为“万国”之一的意识，其后元、清两个异族王朝使民族构造日益多元化，这样的历史遗产一直影响到今日。本书通过丰富的史料，探讨“中国”或“中华”的概念最初在历史上如何成形，在现代史学中又如何被使用。通过考察这种认同的根源，解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

在日本学界，有着四千年历史的“中国”往往被作为一个延续的实体来讨论，作者则强调，“中国”的概念应从历史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与政治上的中国等多元视角来界定。其内涵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本书考察的是“变化的中国”。

这本小书是在前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基础上，提炼、增补而成，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全书分六章：序章——“中国”历史的形成与认同的混迷；世界观——从古代中国“天下观”到现代“世界观”；国境——有关“中国”疆域的讨论；历史——思考长时段的中国文化；周边——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中国、朝鲜、日本的相互认识；现实——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及其它；主要探讨以下话题：一、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是否转化或者如何才能转化为现代中国的“世界观”？二、传统中国的“疆域”是否可以形成或者如何转化为现代中国的“国境”？第三、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国文化”，究竟是如何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第四、近世以来，“周边”尤其是东亚诸国的彼此信任是什么时候消失的？第

五、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究竟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理性力量，带来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

•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2月）



本书主要研究中古时代知识、信仰世界和政治世界的关联性，重点虽然围绕谶纬、术数展开，但是并不局限于此，而是着眼于中古时代统治合法性建立的知识、信仰背景及其内在逻辑。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希望在中古史研究方法和领域的更新与拓展上做

一次有益的尝试，希望能在排除现代理性主义干扰的情况下，从古人的内在逻辑出发，重新审视中古时代的知识史、政治史和思想史。在研究对象上，也正如研究方法揭示的那样，对于往常被政治史和思想史忽略或低估的阴阳灾异、天文测量、五音音律、形法堪舆、星占气象、年历之学，都努力揣度其内在知识逻辑，阐述这些知识与政治、思想之关联。

在中古时代，以“天人感应”和“五德终始”学说为基础的纬学思想，依然是当时政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与谶纬之学相关的符瑞、妖祥、灾异、德运、占候、律历等知识，往往被斥为“迷信”，在研究中遭到忽视。西方学界往往也认为中古中国的政治理论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知识混合体。但实际上，若排除现代“理性”的干扰，与古人处于同一知识水平和思想境界，就可以发现，我们现在视为零碎的、迷信的东西，是古人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严密的内在逻辑，并且在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研究资料的拓展上，作者将往常被忽略的日本术数文献和阴阳道书等纳入考察的视野，拓展了中国中古史研究资料的范围，并且通过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史料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共同勾画出中古时代东亚术数世界的基本轮廓。□

外刊撷英

土屋昌明《道教东传新罗与长安的道观——以〈皇甫奉諲墓志〉为中心》(道教の新羅東傳と長安の道觀——「皇甫奉諲墓誌」を中心に),《东方宗教》第122号,2013年11月

通过考察唐代长安城内外所建道观的具体情况和机能,可以从思想史和社会史两方面深化对唐代道教的理解。本文以唐代长安玄真观主持皇甫奉諲(721—777)的墓志为中心,分四个部分进行了讨论。

第一部分是根据墓志对皇甫奉諲其人的考察。奉諲于天宝元年(742)二十二岁时进入新罗传教;天宝四载返回长安;至德二载(757)进入内道场讲解经义,校勘教典;上元二年(761)以后,受到肃宗的多次赏赐;大历四年(769)补玄真观监斋兼威仪;大历八年迁上座;大历十一年(776)充玄真观主;次年以五十七岁死去。

第二部分是关于道教东传新罗的问题。根据墓志,在742年,依照唐玄宗的命令,奉諲作为“童诵”而“传经新罗”。这里的“经”当是指《道德经》。在此之前,唐玄宗曾在738年遣使赐《道德经》给新罗国王。作者推测,奉諲是作为“童子”们朗诵经文和道教礼仪的教导员而被派往新罗的。这就说明,道教经典已经不仅停留在书籍的文本,而是包括它的宗教礼仪和教

义讲习,一并被传播到了新罗。这样一来,作为唐朝的册封政权,新罗便被纳入到了玄宗为国家祈福的道教礼仪活动中。

第三部分是关于玄真观(景龙观)在道教对外传播中的作用。玄真观在崇仁坊西南隅,先后为高士廉宅、长宁公主第,唐隆政变之后改为景龙观,天宝十二载(753)改名玄真观。司马承祯在睿宗时曾入住景龙观,从此开始至天宝初年,景龙观与洛阳的弘道观、王屋山的金篆斋都是负责整理道教经典的权威机构,在国家性的道教祭祀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后,玄真观存续至唐末,并一直与皇室关系密切。

第四部分讨论道教在日本的传播问题。开元二十三年(735)日本遣唐使中臣名代向玄宗请求《道德经》和天尊像,并带回日本。这时还没有道士随行,故而与奉諲传经新罗相比,这次传教缺少礼仪和讲义的内容。到了753年,玄宗命道士与鉴真同行日本,这个决定很可能是受到他此前命令奉諲等人去新罗一事的影响。由此可见,唐朝皇帝试图将日本视为与新罗一样的册封政权,使其担负起为唐朝祈福的宗教责任。而今后考虑藤原清河等遣唐使的问题时,也有必要将他们放在742年以降唐朝向新罗和日本传播道教的历史背景中去考虑。



丸桥充拓《中国古代的战争与出征礼仪——〈礼记·王制〉与〈大唐开元礼〉的关系》(中國古代の戦争と出征儀禮——『禮記』王制と『大唐開元禮』のあいだ),《东洋史研究》第72卷第3号,2013年12月

广义上说,军事在传统中国的发展过程是一个武力逐渐制度化的问题,而最能体现制度化武力的无非就是军事礼仪。此篇论文则着重讨论战时军队的出征礼仪。

论文首先对《大唐开元礼》所描绘的出征礼仪进行了概括。作者推测,出征礼仪是在南北朝后期才进入军礼系统的,其基本结构集约了一些吉礼、嘉礼等不同范畴的礼仪内容。通过比较《开元礼》中的正礼、巡狩、出征三种礼仪,比较在不同的指挥首脑下(皇帝亲征、制遣大将)、在不同的战争阶段下(发兵、战场、归还)出征礼仪所存在的差异,可知《开元礼》的出征礼仪受到北齐礼制的直接影响。

论文其次考察了出征礼仪的思想渊源。根据《尚书·甘誓》和《礼记·王制》的规定,皇帝对军权不能专断,无论出征还是归还都需要向祖先和社稷报告。但在另一方面,虽然《尚书》的一些篇章也含有“行天之罚”,即战争的正当性来源于天的抽象意识,但在天子告天的实际行动上缺乏明确的记述。同时,由于天罚的行使者只能是天子,故而诸侯和将领只能是从天子手中转接行使战争的权力。

然后是关于出征礼仪的制度化。《白虎通》认为,“天子”与“天”之间的关系是不分内外的,不存在“出”和“还”的关系,从而为天子亲征归还时不告天提出了理论解释。这反映了今文经学的观点。但是,两汉魏晋南朝时期的实际情况却并不符合《白虎通》的论述,不仅天子,甚至大将也可以在凯旋时告天。南朝的儒学士人也对天子凯旋是否要告天产生过争论。反观北朝则稳定地执行了《礼记》和《白虎通》的天子凯旋不告天的主张。基本上延续北朝礼制的唐礼系统虽然从贞观礼、显庆礼到开元礼,在许多内容上都有一个反复的过程,但是出征礼仪的部分并没有变动,一直是排斥凯旋告天的。

石见清裕《从新出〈仆固乙突墓志〉看唐对铁勒仆固部的羁縻支配期》(羈縻支配期の唐と鐵勒僕固部——

新出「僕固乙突墓誌」から見て),《东方学》第127辑,2014年1月

2009年,蒙古—俄罗斯联合考古队在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北约280公里的土拉河东岸发掘出土了汉文《唐金微都督仆固乙突墓志》,这是在蒙古地区首次发现担任唐朝都督的突厥人墓志。罗新和杨富学已经对该志进行了录文和讨论。此篇论文根据墓志原石进行了重新录文,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仆固乙突本人、当时仆固部的情况、铁勒各部的位置、乙突与仆固怀恩的关系。

仆固乙突(635—678)出生时突厥第一汗国已经解体,太宗在漠北设置羁縻府州时乙突正当十二三岁,而标志着突厥复兴的单于都护府内突厥降户的叛乱是在679年,当时乙突已经死去。可以说,乙突正好生活在突厥受到唐朝羁縻支配的时期以内。按照惯例,墓葬当由唐廷鸿胪寺司仪署负责营造,墓志由秘书省著作局撰文,制成之后搬运至墓地,且随葬明器也带有唐人风格,应该是官方埋入的。

永徽二年(651)西突厥的阿史那贺鲁叛乱时,乙突作为仆固部的头领之一参与了唐廷的讨叛战斗。659—663年间,仆固部曾经与其他铁勒部族一起反叛过唐廷,作者推测乙突的父辈被唐廷杀死。麟德二年(665),为安抚铁勒诸部,高宗进行了泰山封禅并让乙突参加。此后,乙突对唐廷效忠,不仅参加了666年唐对高句丽的战争,还参加了这一时期唐对吐蕃的战争。在高宗死后,乙突与其他数十个蕃臣胡将一起,被刻成石像生,立在高宗乾陵。

如果将乙突墓地周边地带视作仆固部的本土,那么可以依据其位置对铁勒诸部在羁縻支配期的地理分布情况做一个概观。仆固部当在与鄂尔浑河交汇的图勒河流域,现在乌兰巴托一带当是仆固部领域的东部或者拔野古领域的西部。

土屋育子《有关岳飞的戏曲作品——以〈东窗记〉至〈精忠记〉的改编为中心》(岳飛をめぐる戯曲作品について——『東窓記』から『精忠記』への改編を中心に),《集刊东洋学》第110号,2014年1月

岳飞(1103—1141)是南宋初期的著名武将,其悲剧的遭遇吸引了许多传统诗文和通俗文学的作家进行



创作。关于戏曲《东窗记》及其改编版《精忠记》，笠井直美已经指出，岳飞故事的改编方向是加大对忠义精神的强调和使用更激烈的语汇来指称敌方。本论文仍旧选取这两部戏曲，着重考察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故事结构经过了怎样的改编，二是登场人物尤其是反面人物的形象经过了怎样的改编。

作者首先对两部戏曲的现存文本进行了梳理。《东窗记》的底本为富春堂刊《新刻出像音注岳飞破虏东窗记》，全40折。《精忠记》的底本为汲古阁刊《六十种曲》，全35出。在二书之前，已有《东窗事犯》、《岳飞精忠》等戏曲的故事情节与之类似。比较故事结构可知，《精忠记》对《东窗记》的部分章节进行了削除、增补、合并、移动、拆分等改编。对比史实可知，《精忠记》在史实的基础上增补了插话，但同时也保留了一些明显不符合史实的虚构。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精忠记》对于反面人物如万俟卨、秦桧等人，将他们杀害岳飞之后的心理活动改编得更加冷酷无情。

通过考察可见，《精忠记》比《东窗记》更为尊重史实，但是对那些已经获得观众认可的不实情节则采取了保留的态度。《精忠记》删除了有关反面人物的同情心或后悔心理的表现，以史书为蓝本强化了秦桧的恶人形象，使其显得更为反动。作者认为，两书刊刻者彼此所想定的读者层并不一致，很可能是造成这种改编的原因。刊刻《东窗记》的富春堂是南京唐氏的书坊，主要面向上层社会的士大夫、妇女和孩子，他们能够接受反面人物的人性一面；而刊刻《精忠记》的常熟汲古阁主要是面向苏州周边的士大夫，他们更喜好接受以史书为基础的立场鲜明的故事和人物。然而，汲古阁的改编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一些故事场面被删除之后，与其后面的情节在衔接上变得不够自然了。

Rostislav Berezkin, Boris L. Riftin《〈香山宝卷〉现存最早的版本以及宝卷与佛教说法文学之间的关系》(The Earliest Known Edition of The Precious Scroll of the Incense Mountain and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Precious Scrolls and Buddhist Preaching), *T'oung Pao*, Vol. 99, No. 4-5, 2013

本文介绍越南河内汉喃文献研究所所藏《香山宝

卷》木刻本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并解释其在宝卷文学形式发展历史中的特殊地位。本宝卷是越南后黎（黎末）王朝显宗景兴三十三年（1772）重刊本，原本是在中国嘉兴府楞严寺委托南京的陈龙山经房出版。原版的题记未注年代，但是南京的版本已是重刊本。《香山宝卷》叙述的是观音菩萨的前生——妙善公主——修行成道的故事。俄罗斯学者李福清院士在1973年于河内发现了这个版本，越南重刊本带有《御制刊刻香山宝卷序》，表明此本刊刻得到越南宫廷的资助。该《香山宝卷》版本是20世纪之前在中国之外出版的独一无二的宝卷文本，这说明对女神形式的观音菩萨的信仰以及与其有关的通俗文学作品已经在18世纪流传到越南，之后这种信仰也在越南繁荣起来。

此《香山宝卷》版本在中国早已失传，仅存一部晚期的民间科仪文本（1876年的抄本，全名为《慈悲香山道场法卷》），该文本大部分的内容与《香山宝卷》越南重刊的版本相同。越南重刊的版本《香山宝卷》与杭州昭庆大字经房乾隆三十八年（1773）刊刻的另一版本形式完全不同，后者现藏于日本，也为木刻本孤本（原由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先生收藏）。本文对这两个版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越南重刊的版本年代要早于杭州刊刻的版本。在结构上，应是十六或十七世纪初的版本。越南重刊的版本正文每段有固定的结构，分为《妙法莲花经·普门品》的一段、叙事散文的部分、七言对联、十六行七言诗、歌赞与四行五言诗，此宝卷版本也有复杂的“开经”和“结经”的部分。此结构接近14—15世纪的宝卷文本以及更早的佛教说唱教义作品《消释金刚经科仪（宝卷）》（约13世纪中期的作品），而其“结经”的部分类似16世纪的宝卷作品。但因为此《香山宝卷》引用佛经，它是14—16世纪叙事宝卷中极其独特的作品；它同时也保留了佛教讲经说法仪式的特点。

Jinhua Chen《“夷”面华僧？智慧轮（？—876）与晚唐密宗》(A Chinese Monk under A “Barbarian” Mask? Zhihuilun (? -876) and Late Tang Esoteric Buddhism), *T'oung Pao*, Vol. 99, No. 1-3, 2013

智慧轮是公元9世纪时期的密宗高僧，也是促使



密宗向日本传播的关键人物。以往人们对他的了解,主要依据宋代僧人赞宁所著《宋高僧传》。但相关典籍记载及新出土的文物资料却表明,赞宁对智慧轮的记载多有不确或错误之处。本文依据这些材料,试图厘清赞宁记载中有关智慧轮的错误,并重建其重要事迹。

从陈思所撰的《碑刻丛书》与康骅及张礼所提供的文本资料可以看出,智慧轮出生于长安杜陵,可能是来自于丁姓家族的汉人,卒于公元876年。他是唐代密宗创立者不空的第三代弟子,为当时密教中心大兴善寺的僧人,居于大教注顶院,生前曾获“遍觉”尊号,死后又获“普照”、“彰化”的谥号。而其两位外籍弟子圆珍和宗叡,则是日本密宗两大教派台密与真言宗的领袖人物。法门寺出土的文物资料则表明,在公元871年秋至874年初,智慧轮策划了唐懿宗和僖宗举行的一系列迎送佛骨舍利的活动,并捐献了多种密宗法器。由此可见,智慧轮在当时政治和宗教领域有着显赫的地位。

智慧轮也有部分作品得以传世:阐释对佛法本质认识的《明佛法根本》,被称为《智慧轮悉昙章》的梵文字母表;编订的两套密宗仪式:《圣欢喜天法》和《最上乘瑜伽秘密三摩地修本尊悉地建立曼荼罗仪轨》(全本已佚);两本归于其名下的翻译著作:《摩诃吠室啰末那野提婆喝啰阡陀罗尼仪轨》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些资料显示他精通梵文,对密宗教义及仪式有深厚修养。

通过对智慧轮重要事迹的重建,作者认为赞宁所作《宋高僧传》存在很多错误,为还原历史真实,研究者在使用佛教内典资料时,要认真比对外典的相关材料。这样可以避免以往僧侣传记中记载不确或错误的弊端。

Ya-hwei Hsu《古物、礼仪改革与宋徽宗时期宫廷审美的重塑》(Antiquities, Ritual Reform, and the Shaping of New Taste at Huizong's Court), *Artibus Asiae*, Vol. 73, No. 1, 2013

《宣和博古图》是了解宋徽宗时期宫廷艺术的重要素材。该书的编纂与宋徽宗的礼制改革密切相关。在他的构想中,礼制改革当以复古三代之“礼”为目

标,而以搜集整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为途径,重建古代礼仪及其载体之青铜礼器,以此展现自己对上古礼仪的践行,建构自身如同古代圣贤君王之形象。而《宣和博古图》则是在搜集整理青铜器的过程中,对所得器物进行考订、分类和摹绘,并将器物所载典礼仪式固定化和系统化的成果。与此同时,徽宗及其大臣在制作青铜礼器时,力图在样式、纹饰等方面最接近上古之法。其中大晟钟的铸造最为典型,其铸造风格以三代青铜器为模板,在十年间不断被修改,彰显了徽宗时期复古之风的兴盛。

此种复古之风也影响到了瓷器的制作风格。汝窑制作的瓷器釉质较厚,釉面绵密柔顺,正是借鉴了青铜礼器稳定、厚重的风格,其装饰也意图让观者感到与古代青铜礼器的关联。而定窑甚至直接以古代青铜器造型为瓷器制作的摹本。不过因为瓷器主要是用于宫廷内部的装饰,以此展现所有者的文化修养与审美情趣,因而其变化也与青铜礼器精准仿制商周器物的做法不大相同。这些取向也对宫廷艺术的其他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宫廷审美新风格的形成。

宋徽宗利用不同的艺术才能,将技艺与艺术融合成为统治之术,构成其统治政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11世纪士大夫对三代理想的“复兴”则主要是一项知识运动。宋徽宗将自己的政治理念付之于实践,引发了宫廷文化及物质世界的激进变革:古物研究给新铸青铜礼器注入了历史内涵,同时在瓷器装饰艺术中增添了新的知识内容。

Ari Daniel Levine《南宋使节行纪中有关金朝开封的集体记忆、故土怀恋和错乱认知》(Welcome to the Occupation: Collective Memory, Displaced Nostalgia, and Dislocated Knowledge in Southern Song Ambassadors' Travel Records of Jin-dynasty Kaifeng), *T'oung Pao*, Vol. 99, No. 4-5, 2013

南宋赴金使节在开封的见闻录,不仅为了解这一时期开封的城市状况提供了资料,更为研究这些文学精英对故都开封的怀恋之情与文化记忆提供了可能。本文利用楼钥《北行日记》、范成大《揽轡录》、周辉《北辕录》和程卓《使金录》,试图说明在南宋文学精英的这些文本



描述中,往往借用此前开封作为北宋都城的地理知识,重构了他们对金朝开封的空间认知与记忆图谱。

金朝占领开封后不久,该地就成为南宋使节赴金都燕京的重要中转站,但金人对南宋使节的活动范围有严格限制。本文所取的行纪材料,就是南宋使节过境开封时的所见所闻。不过,他们对金朝开封的描述,则主要依据北宋时期的相关地理知识。如楼钥和范成大都依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将金朝新建城门误认为是原北宋城门。程卓则因为疏忽及缺乏“靖康之变”以前的地理知识,未能识别其先辈们认出的重要地标。他们集体记忆中的城市空间与亲眼所见的状况存在很大差异。正是由于他们过度依赖已有的地理知识,导致对已变化的城市空间的认知出现错误。

南宋使节对故都的怀恋,影响了对金朝开封的感知。在他们的描述当中,金朝开封已是“堕落之城”——不被重视、人口减少、积贫积弱。尽管这些描述确能反映金朝开封的某些真实情况,但也带有他们强烈的个人情感。当他们经过开封时,都表现出对故都逝去之物的怀恋,以及对金人侵占开封的憎恨。从更深层次上看,这些带有强烈个人感情色彩的行纪,展现了南宋文人墨客对文化与政治危机的感知。而写作者受到南宋流亡文学知识的影响,将逝去的城市空间变成了个人凭吊怀古的场所,丰富了南宋人对故都的集体记忆,又促进了南宋流亡文学的发展。

通过追寻消失的、毁坏的和重建的地标建筑,这些使节为南宋观众及朝廷“制作”了有关故都的地理知识。当年流亡幸存者口耳相传的描述和流传下来的文本再现,构成了南宋人对开封地理空间的认知框架,使节们的私人行纪进一步丰富了其中的内容,也成为此后文人墨客共享的集体记忆。

Stephen G. Haw《蒙古征服西藏》(The Mongol Conquest of Tibet),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4, No. 1, 2014. 1

以往对蒙古征服西藏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的”观点,即成吉思汗时期西藏已臣服于蒙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蒙古是在公元1240年征服了西藏。本文通过对不同历史文献的考证,发现蒙古对西藏的征服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过程,早期主要是对西藏边境的侵扰,之后则是强力的入侵。

造成人们对蒙古征服西藏情况了解不够的原因,主要是历史文献记载的缺乏和混乱。当时蒙古和西藏对该事件少有较为可靠和翔实的记载;波斯语文献中对西藏(Tibet)与西夏(Tangut)的混淆,更加剧了人们对该事件认识的混乱;虽然中文文献对该事件的记载最为可靠,但由于中文文献过度关注中国的中心地带,对蒙古在其他地区的活动则语焉不详。

就蒙古征服西藏的情况来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成吉思汗时期,可能在公元1218年以前已有入侵西藏的计划,后因征战西辽和花剌子模而搁置。在随后蒙古军队进攻西夏时,曾侵占了西藏的北部及东北部地区。在1226年以前,部分藏人已经降服蒙古。成吉思汗时期所取得的成果,为之后蒙古征服西藏奠定了基础。在窝阔台时期,蒙古进一步侵入西藏东部地区,但试图全面征服西藏的计划因窝阔台之死而中断。1251年蒙哥即位之后,征服西藏的计划得以迅速推进,西藏大部分地区应在1253年前已被征服,因为这一年忽必烈曾过境西藏去征服大理。而蒙古人征服大理之后,兀良合台又率军进入西藏,可能征服了西藏与云南交界的尚未臣服之地。在1250年代,蒙古初步设立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如在1255年设立了十三万户,专门管理西藏地方事务。到1260年代,忽必烈进一步完善了西藏的统治结构,将西藏纳入蒙古的有效统治中,这也标志着蒙古对西藏的彻底征服。□

陈磊、朱文哲 摘译

第四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招生启事

2014 年 6 月 20—29 日

为促进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的中外学生交流与培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将于 2014 年 6 月下旬在复旦大学合作举办第四届“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

一、招收对象

- 1、欧美各大学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博士候选人 15 人(申报者的中文要求:听、说熟练);
- 2、上海市各高校人文学科类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15 人;
- 3、日本、韩国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领域博士候选人 5 人(申报者的中文要求:听、说熟练)。

二、日程安排

上课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801 室

6 月 20 日(周五) 报到,外国学生入住宾馆(复旦大学附近)

16:00-17:30 中外学生见面会、介绍复旦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料库

6 月 21 日(周六) 文化史与艺术史,主持人:邓菲(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上午:大木康(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长) 明末清初文人冒襄及其周边

下午:李仲谋(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中国陶瓷

晚上:课程讨论

6 月 22 日(周日) 参观考察

6 月 23 日(周一) 区域史与全球史,主持人:段志强(文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上午:艾尔曼(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 Evidential Learning in China, Japan, and Korea in the Lat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y 乾嘉时代中国、日本和朝鲜的考证学

下午:王国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研究所教授、所长) China in Regional and Global History from Early Modern to Modern Times 前近代至近代区域史与全球史中的中国

晚上:课程讨论



6月24日(周二) 参观考察

6月25日(周三) 宗教史与思想史,主持人:朱
溢(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上午:杨志刚(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院长)
明清时期的孔庙文化与儒教信俗

下午:麦谷邦夫(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隋唐道教思
想史

晚上:课程讨论

6月26日(周四) 参观考察

6月27日(周五) 上午:分组讨论

下午:结业典礼

6月28日(周六) 自由活动

6月29日(周日) 退房、研修班结束

三、费用

学生承担部分:往返上海的机票及机场至复旦大
学的交通费;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承担部分:1、日程中安排的
参观考察费用;2、外国学生在上海的住宿费;3、所有学
生在上海的餐费。

四、学分和证书

参加研修班的复旦大学学生修满课程时,可得一
个学分;结业时,向全体学员发放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颁

发的结业证书。

五、报名

报名表:上海学生、日本、韩国学生填写“报名表”
(可在文史研究院网站下载)后请导师签署意见;

报名时间:2014年3月1—31日;

投寄方式:

1、将报名表投到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8楼
“2014暑期研修班”信箱

2、或邮寄至: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复旦大学文史
研究院 办公室 200433

3、或将签字的报名表扫描后发送到 wsyjjy@fudan.edu.cn

联系电话:86-21-5566 5284;

* 欧美学生报名由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组织,联
系人:艾尔曼教授, elman@princeton.edu, 欧美申请截
至2014年5月1日。

六、入选名单公布

公布时间:2014年4月15日前后;

公布方式:文史研究院网站 <http://www.iahs.fudan.edu.cn>。□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纪事

(2014.01—2014.03)

• 2014年1月4日—2月10日

邓菲副研究员赴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并做两场学术报告,题为“図像の復古と再造:宋金元喪葬芸術における「孝子」画像”(东文研所长大木康教授主持)与“Realms Beyond: Half-open Doors in Burials”。

• 2014年1月31日—2月5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赴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中国中古の学术と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报告题目为《转轮王的七宝:佛教对中古政治修辞的影响》。

• 2014年1月

葛兆光教授著《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思想史·上卷》英译本由荷兰 Brill 出版社出版。

孙英刚副研究员论文《从“众”到“寺”:隋唐长

安佛教中心的成立》发表在《唐研究》第19卷;《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中心观》发表在《复旦学报》2014年第1期“文史研究新视野”栏目。

张佳助理研究员论文《重整冠裳:洪武时期的服饰改革》发表在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2014年第1期。

朱溢副研究员书评《罗柏松〈权力之境:中古中国南岳的宗教景观〉》发表在商务印书馆编《中国学术》第11卷第1辑。

• 2014年2月15日

王鑫磊助理研究员应邀赴法国雷恩第二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为期两月,为该校中文系学生开设《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并在该校国际语言学院做三次学术报告,题目分别为《同文书史:朝鲜半岛汉文文献对中国历史研究的价值》、《文化比赛:从古代朝鲜人的日本游记看东亚文化互动》



以及《完璧归朝:十七世纪初一个朝鲜人的越南见闻》。

• 2014 年 2 月 20 日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Micheal Schiltz 副教授来我院进行三周的学术访问,访问课题为 The Role of YSB, Shanghai Branch in the Bank's Flow of Funds。

• 2014 年 2 月 20—24 日

葛兆光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邀请,在该校作“丘镇英学术讲座”,题目分别为《“中国”的困境:从近世历史看中国》和《纳“四裔”入“中华”: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考古与人类学家重建“中国”的努力》。

• 2014 年 2 月

葛兆光教授著《中国再考:その領域・民族・文化》由岩波书店出版。

孙英刚副研究员著《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白若思副研究员论文《〈香山宝卷〉现存最早的版本以及宝卷与佛教说法文学之间的关系》发表在《通报》(T'oung Pao)第 99 卷第 4-5 期;《俄罗斯藏稀见〈目连宝卷〉抄本及其在宝卷文学史上的地位》发表在美国《中国演唱文艺学刊》第 32 卷 2 号。

本月,我院新招收的两位博士后研究人员报到:朱文哲博士,研究课题为“近代中国的时间观念与历史书写”,合作导师为葛兆光教授;陈磊博士,研究课题为“‘真诗’论的形成:程朱理学背景下的诗论发展”,合作导师为杨志刚教授。

• 2014 年 3 月 3 日

我院组织 2014 年“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博士方向的申请者面试。

• 2014 年 3 月 4—6 日

杨志刚教授赴日本冲绳参加琉球汉文文献国际研讨会。

• 2014 年 3 月 6 日

我院举办第七十四场小型学术研究会,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我院访问学者 Michael Schiltz 作题为《通往帝国之路的货币:日本黄金单本位制的确立(1873—1897)》的报告,历史系朱荫贵教授主持。

• 2014 年 3 月 8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赴南京大学参加“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国际青年学者工作坊,并发表题为《李承乾与普光寺僧团》的学术论文。

• 2014 年 3 月 13 日

我院举办第七十五次小型学术研究会,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美术学院艺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复旦大学中华文明中心访问学者罗汇(Rui O. Lopes)博士作题为《葡萄牙中国学研究之路:过去、现状与未来》的报告,董少新研究员主持。

• 2014 年 3 月 16—21 日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大木康教授应邀来复旦大学担任高端外国专家,进行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

• 2014 年 3 月 18—21 日

我院与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合作举办“复旦大学—京都大学东亚人文研究博士生研讨会”,京都大学地理学研究室田中和子教授、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室木津祐子教授带领 12 名博士生,与复旦大学人文学科的 16 名博士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交流和参访。

• 2014 年 3 月 19 日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清代举子之旅:从广东到北京》的学术讲演,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主持。



• 2014 年 3 月 21—22 日

孙英刚副研究员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首届佛教疑伪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题为《灵山显迹——〈大云经疏〉和〈宝雨经〉的一处细节》的学术论文。

• 2014 年 3 月 22 日—4 月 8 日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板仓圣哲教授到我院进行为期半月的学术访问,访问课题为《钟馗画像在东亚的发展和延伸》。

• 2014 年 3 月 24 日

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郑培凯访问复旦大学,并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特别讲演,杨志刚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参加了在文史研究院举行的与史景迁教授、郑培凯

教授的座谈会。

• 2014 年 3 月 25 日

我院组织 2014 年“亚洲宗教、艺术与历史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复试。

• 2014 年 3 月 26 日

“交错的文化史”研习班举行第三十五期研习班,我院特聘研究员徐文堪先生作题为《关于印中语言接触史的一些问题》的报告。

• 2014 年 3 月

葛兆光教授著《何为中国?——疆域、民族、文化与历史》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朱莉丽助理研究员受聘为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金秀英 整理



2014年3月19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大木康教授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清代举子之旅：从广东到北京》的学术讲演（左图）。24日，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郑培凯、耶鲁大学历史系高级讲师金安平，共同为“复旦文史讲堂”作题为《在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特别讲演（右图）。



2014年2月，葛兆光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作“丘镇英学术讲座”两场，其一题为《纳“四裔”入“中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考古与人类学家重建“中国”的努力》。

2013年12月26日，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杨志刚教授报告《遥远的史实，近旁的回响：孔庙历史与遗产漫谈》。



2014年3月，文史研究院小型学术研究会：6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Michael Schiltz副教授报告《通往帝国之路的货币：日本黄金单本位制的确立（1873-1897）》（左图）；13日，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美术学院艺术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罗汇（Rui O. Lopes）报告《葡萄牙中国学研究之路：过去、现状与未来》（右图）。

封面题字 王元化

封面底图 朝鲜通信使行列图：登城行列（卷轴）

编 辑 杨琴、肖军

地 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 200433

电话/传真 86-21-5566 5284

邮 箱 wsy@fudan.edu.cn

网 站 www.iahs.fudan.edu.cn

